

每一棵都是历史

■本报记者胡琅琦



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》制作团队供图

力的进步、人口迁移、技术传播,这些植物在经济、文化领域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影响,以及对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意义。而它所包含的信息也覆盖了从植物学到古生物学、遗传学、历史学等等学科范畴。

以自然科学作为开始,以人文社科作为结尾,但作为一部自然纪录片,李成才对后者的表达显得尤为克制。

“我们无意通过这部纪录片渲染‘厉害了我们的国’。”李成才一再解释,“我们始终把自然的馈赠放在第一位,其次才是人类的创造。”

在谈到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思路时,李成才提炼了几个关键词:最重要的就是“生命”。每一个生命都有情感,正如分集导演张帆所说的,拍摄者要去探索的是“这个生命奇迹背后的磨难是什么,求索是什么,艰难付出是什么,喜悦渴望又是什么”。虽然不能把植物在它们的世界中活动的方式与人类行为等同起来,但当影片在使用那些通常只用于表达人类情感经验的词语时,其实是一种希望以个体生命的立场去尝试理解另外一种生命的用心。

此外,李成才强调,纪录片观察植物、记录植物,认知植物的方法首先是“科学”,然后才是“审美”“文明”以及“哲学”层面的延伸。

在他的内心,更愿意把这部纪录片视为关乎生命、科学和爱的记录。

植物学家的精神力量

在中国,自然纪录片是所有纪录片类型中的稀缺品,其中植物学纪录片更是凤毛麟角。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》的探索带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,就是镜头语言的国际化,网友们纷纷感叹“每一帧都是壁纸”。其次,周渐昆也肯定了纪录片文本在灵活、生动地解剖科学知识、讲好植物故事方面的努力,“这部片子为中国的植物学吸了一波粉”。

而对于一个过去主要从事人文历史纪录片拍摄的团队而言,两年的实践面临巨大挑战。

一方面要去到高原雪山、热带雨林和沙漠戈壁这样的极端环境艰难地寻找植物,另一方面要非常细致、细致地观察植物,并在持续的一段时间里去捕捉能被肉眼所识别的生长变化。在李成才看来,植物没有语言,行动又十分缓慢,因此,展示植物的过程所投入的努力要超过其他纪录片类型。

100多人的摄影师团队,有的在野外驻扎捕捉植物的自然状态,有的在棚内延时拍摄花费近一年时间,将植物漫长的生长过程浓缩成几秒钟,或用高速摄影定格肉眼难以观察的爆发时刻,用显微摄影进入植物器官内部带来视觉奇观,还有大型航拍、水下摄影、定格动画等等。纪录片最终拍摄的植物素材将近400T,所有素材浏览完毕需耗时1200个小时。

在这个过程中,来自中科院的100多位植物学界的科学家深度参与了创作。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支持,成为拍摄团队在野外的“领路人”。从事植物学研究是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兼有的工作,到野外考察,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,是这些科研人员的日常。他们孜孜以求的科学态度和对植物的无法抑制的爱怜,也为创作团队带去了强烈的精神力量。

也是从这些科学家身上,释放出了李成才渴望通过纪录片传达的“万物生命如何平等、如何尊重、如何呵护的一种情怀”。

撬动对植物的关注

“全世界的人怎能不对植物有兴趣呢?”丹尼尔·查莫维茨在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中所发出的感叹,在现实中却未必能被所有人理解。

动物学向来比植物学更吸引人,有更高的显示度,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。在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周渐昆看来,因为植物是静态的,生长变化非常缓慢,不如动物来得生动有趣。同时,也由于植物对于人类的生活太过稀松平常,反而不受重视。

可事实上,植物对世界、对人类的影响,并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。植物在地球上占据了关键地位,地球失去了植物,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。从地球上出现作为生命最高级形式的人类,我们就踏上了开发、利用植物的征途。在这场征途中,来自中国的植物又发挥着特殊的作用。

三年前,曾拍摄过《大国崛起》《华尔街》《货币》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坚持要做一部讲述中国植物故事的纪录片。

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植物资源大国。周渐昆也提到,地球上已知的植物有30

多万种,其中有十分之一就生长在中国,且覆盖了从热带、亚热带、温带、寒带的各种生态类型。9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范围内,中国的植物种类是美国的1.5倍,欧洲的3倍。无论是植物的丰富性、多样性还是特有性,在全世界都是得天独厚。

“从另一个角度看,中华文明的源头是乡土文明,是农耕文明,可以说是植物塑造了中华文明。”李成才说。农业的发明让人类定居成为现实,而作物的栽培则是农业起源和人类定居的重要标志,自人类栽培植物以来,粮食作物、各种蔬菜就开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长期的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,植物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。

生长在英国的植物仅有4000多种,只有相当于神农架一个地区的植物种类数量,可一个BBC就诞生了那么多经典的植物学纪录片。中国能否拥有一部分可以撬动我们对植物关注和思考的纪录片?

“向前是为了生活,向后是为了理解生活。到底向后多少,才能理解得更深刻?”李成才希望这部纪录片多向后回溯一些,从生命的诞生、植物的出现、人与植物关系的建立出发,重新认

识和理解一种生命观。

自然的馈赠是第一位的

《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》拍摄制作周期历时2年,200多位主创分成8个主要拍摄团队,走访了国内27省的93个地区,以及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新西兰、印度、马达加斯加7个国家的30多个地区,最终选取了21科28种植物的素材,凝聚成了这部十集系列纪录片。

植物与人类最重要的相遇诞生了粮食,这是人类定居的物质基础,在中国,这种植物就是水稻。此后,有更多植物走进了人类的生活。比如,大豆和水果为人类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,竹子变成建筑和家具,桑叶中的蛋白质通过蚕变成了服饰,茶叶变成了一种饮料,本草变成了良药。当人类文明走得更远,植物花卉还走进了园林,成为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外化。

这部纪录片严格遵循着这样一种叙事的逻辑,从最初探寻这些植物在野生环境中演化的来龙去脉,讲述它们与自然界本身的互动,再到与人类产生交织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,随着生产

说史

杜润生科技政策思想方法浅析

■贾宝余

2015年10月9日,杜润生先生逝世。在他去世4周年之际,本文从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的制定切入,浅析杜润生科技政策的思想方法,以表达对这位老一代科技管理专家的深切缅怀。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。70年来,在党的正确领导下,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、不懈努力,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了从跟跑、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,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,并正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。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从实施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到实施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》,坚持加强领导、坚持战略引领、坚持规划先行,始终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内涵,也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制胜法宝。

作为党内资深农村问题专家,杜润生先生被誉为“中国农村改革之父”。但鲜为人知的是,杜润生职业生涯的“黄金岁月”是在科技战线度过的。1956年—1966年,杜润生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、秘书长、党组副书记等职,直接领导和亲身参与了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十二年科技规划》)、《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(草案)》(以下简称《科学十四条》)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。在科技规划和政策制定中,杜润生提出的工作思路、原则和思想方法,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,也对此后各阶段的科技规划制定发挥了启示作用。

任务为经、学科为纬,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与国家建设需求紧密结合

1956年1月,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:“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科学技术水平”向现代科学进军,

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”毛泽东主席同一时期也强调了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问题。为此,1956年3月,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,陈毅担任主任,李富春、郭沫若、薄一波、李四光担任副主任,张劲夫担任秘书长,杜润生等担任副秘书长。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,就是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。

这个规划怎么搞?700个科学家议论纷纷,16位苏联专家也是各抒己见。吴明瑜在《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》中提到一个细节:当时苏联顾问拉扎连柯住会长会场,“也是非常着急,又想不出办法。他个头又高又大,那时正好是夏天,又没空调,热得不得了,一热就跑到卫生间用冷水冲脑袋。这个人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,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
如何解决任务与学科的关系,是规划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张劲夫请杜润生出主意,杜润生提出把“重点发展,迎头赶上”作为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方针,迎头找到科学的新生长点,瞄准世界科学的前沿部分,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,重点发展;并提出“任务为经、学科为纬”的方法,把任务和学科交织起来。这样,“会上几百人的思想就统一起来了,成了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”。大家展开讨论,最后归纳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,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12项重点任务。

通过十二年科技规划,首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之中,加快了我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。中国科学院把“四项紧急措施”纳入行动计划,由此带动了计算机、自动化、电子学、半导体、新型材料、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,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,以致此后10多年时间就有了“两弹一星”的重大成就。

夯实基础、注重应用,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中心任务是出成果、出人才

新中国成立之初,服务工业和农业生产是科技战线的重要任务。对此,杜润生认为,科学研究机构的“产品”是“生产”合乎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成果、能够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才,“出成果”和“出人才”是互相依存、互相转化的

关系。科学工作应与生产紧密联系,技术工作应与生产紧密结合,但是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技术都为生产服务,比如某些天文知识、宇宙的起源等等,就无法和今天的生产联系,难道就不要研究吗?他的这一观点,和19世纪末一位美国科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1883年,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·奥古斯特·罗兰在题为《为纯科学呼吁》的演讲中,呼吁美国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纯科学研究,这被后世称为美国科学的“独立宣言”：“为了应用科学,纯科学本身必须存在。”

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发展,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。罗兰在美国纯科学的呼吁,与20世纪50年代杜润生对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思考遥相呼应,这些观点共同体现了对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充分尊重。

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基础研究,并非忽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。杜润生就此认为,“科学面向生产,与其说是科学去帮助生产,倒不如说是找生产来帮助科学。任何地方任何时候,可以推动科学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,只是社会生产。”

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,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,科研与社会生产和经济社会深入互动显得更加迫切。此时在农业战线工作的杜润生就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指出:“把现代科学技术输入到农村中去,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的技术差距,这无疑是科学技术领导机关和广大科技人员的重要历史使命。”这体现了杜润生对科研机构运行规律、科技与经济互动规律的尊重。

尊重科学、尊重科学家,改进研究机构的领导制度,巩固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

1957年1月,我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,征求苏联科学家对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意见,同苏联政府商谈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科学技术研究合作的协议。杜润生访苏回来后,给中央写报告,认真分析了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训,指出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大量地、

残酷地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不恰当,认为我国不应当照搬苏联的做法。

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,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有关文件,提出了“批而不斗”“斗而不戴”等方式,尽量保护科学家,为科学家服务。这个文件得到中央批准下发后,中科院北京地区的高级研究人员没有一人被划为右派。

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机构内党组织的主要任务,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,而必须不断加强。1961年,杜润生主持起草了被邓小平称为“科学工作的宪法”的《科学十四条》。《科学十四条》提出:党组织在研究机构做好领导工作的主要标志,就是充分调动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,使大家心情舒畅,朝气蓬勃,积极进取,多出研究成果。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,必须正确地执行政策,改进工作方法,进行一系列艰巨的工作。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“红”与“专”问题,《科学十四条》提出了“初学红”的概念,即:我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、拥护社会主义的,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,他们已经“初学红”。中央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,肯定广大知识分子“初学红”。这些政策设计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

改革开放后,年届七旬的杜润生为掌握农村发展实际,调研走访全国25个省份240个县,主持起草了5个中央“1号文件”。他晚年在参加一次研讨会上曾自谦地说:“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。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。”实际上,杜润生的符号意义,不仅限于农业领域。在科技领域,这个符号代表了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、实事求是、知行合一、注重调查、善抓本质、科学民主、创新奉献等优良传统。这种传统,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重大成就背后的精神密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目前,我国正在研究制定2021—2035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。回顾建国初期我国科技规划的工作,对于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,更好地编制一个适应新时代要求、体现改革开放精神、支撑大国崛起的科技发展规划,有效推进科技改革、加快实现科技强国“三步走”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(作者单位: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)

声音

“在文学上没有所谓的高峰,最多是一个小山丘,人们可以在上面建一些葡萄园之类,还可以让孩子在这个小山丘上玩,而这就是文学。文学不应该用石头直接堆积起来,也不应雕刻出来,所以不是固体的,而更多应该是水,是空气。”

——彼得·汉德克(Peter Handke) 2016年访问中国时如是谈及文学。10月10日,这位奥地利作家终于迎来了荣誉的高峰,他和波兰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(Olga Tokarczuk)分别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和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汉德克1942年出生在奥地利一个铁路职员家庭,后随父母在柏林生活。1961年入格拉萨茨大学攻读法律,开始参加“城市公园论坛”的文学活动,成为“格拉萨茨文学社”的一员,从此走上文学之路。他以独具风格的创作在文坛上引起了持久的争论,更确立了令人仰慕的地位。从1966年成名开始,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,获得多项文学大奖,如“霍普特曼奖”(1967年)、“毕希纳奖”(1973年)、“海涅奖”(2007年)、“托马斯·曼奖”(2008年)、“卡夫卡奖”(2009年)等。

托卡尔丘克1962年出生于波兰西部的一个小城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,她一直致力于诗歌创作,并于1989年发表了诗集《镜子里的城市》。1993年,她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《书中人物旅行记》,立刻引起广泛关注,并因此获得波兰图书出版协会奖。此后,她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。迄今为止,托卡尔丘克已发表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总计17部。


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(左)和彼得·汉德克

“三年了,人活着总得有个信吧。”——公交车上由演员任素汐扮演的女主角面对失踪三年的爱人的这句话,令许多观众泪奔。这是正在热播的国庆献礼片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《相遇》篇的一个场景。该篇讲述了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,高远(张译饰)献身国防科技事业、奉献了爱情和生命的感人故事。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由7个单元组成,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,祖国经历的无数个历史性经典瞬间。影片一改以往人物展现大事件的主旋律电影常用表达方式,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展现时代变革,将个人际遇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,更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。该片自上映后一路高歌猛进,上映10天总票房已超过23亿元,挺进华语影史票房前十,上座率、场均人次均领跑国庆档,社交媒体上也口碑持续爆棚。(周天)



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剧照

英国上议院议员麦克·贝茨和夫人李雪琳,身着“为友谊行走”的T恤,用一个月的时间从杭州至温州徒步旅行,他们以丰富生动的徒步影像和诙谐有趣的语言,传递出生机勃勃、活力洋溢的新时代中国形象。这正是纪录片《之江故事》所展现的内容。

10月9日,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、外文局中国报道杂志社解读中国工作室制作的纪录片《之江故事》在北京举行全球首映仪式。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、英国上议院议员麦克·贝茨、中国外交协会副会长杜占元、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宋敬武出席活动并致辞。

片中,麦克·贝茨带着对精准扶贫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中国话题的好奇与思考,走进浙江下姜村、义乌“中欧班列”始发站、磐安古茶场等地。

麦克·贝茨还以英国政治家的独特视角,记录和讲述了徒步旅行时遇到的中国普通人的鲜活故事。他们中既有村党支部书记、农民、工人,也有民营企业家人、画家、归国华侨等,全景式、多角度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70年发展成就的切身体会和的幸福生活的追求向往。

据悉,10月13日起,《之江故事》将在美国CNBC电视台、华尔街日报网、中央电视台以及多个新媒体平台投放播出。(崔雪芹)

纪录片《之江故事》全球首发